

New History Salon

新史学沙龙

陈启能
王学典
姜芑
主编



历史的两面： 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

[美] 威尔玛·伊格尔斯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著
孙立新 蒋锐 等译

Zwei Seiten der Geschichte
Lebensbericht aus unruhigen Zeiten



大学出版社

New History Salon

新史学沙龙

陈启能
王学典
姜芃
主编

历史的两面： 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

[美] 威尔玛·伊格尔斯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著
孙立新 蒋锐 等译

Zwei Seiten der Geschichte
Lebensbericht aus unruhigen Zeiten

山东
大学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美)伊格尔斯,(美)伊格尔斯著;
孙立新,蒋锐等译.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3
(新史学沙龙)
ISBN 978-7-5607-4972-3

I. ①历...

II. ①伊... ②孙... ③蒋...

III. ①伊格尔斯,G. — 回忆录 ②伊格尔斯,W. — 回忆录

IV. ①K837.1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1074 号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2 号(250100)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规 格: 720 毫米×1010 毫米(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79 千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新史学沙龙》编委会

主编

陈启能 王学典 姜 芃

顾问(以姓氏英文字母为序)

Car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墨西哥)

Jerry Bentley 杰里·本特莱(美国)

Peter Burke 彼得·伯克(英国)

Alexander Oganovich Chubarian

亚历山大·奥加诺维奇·丘巴里扬(俄国)

Brian L. Evans 布赖恩·埃文斯(加拿大)

Carlo Ginzberg 卡罗·金兹伯格(意大利)

Dirk Hoerder 狄克·霍德尔(德国)

Georg G. Iggers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美国)

Juergen Kocka 于尔根·科卡(德国)

Chris Lorenz 克里斯·洛伦兹(荷兰)

Boris Nikolaevich Mironov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

Lorina Petrovna Repina

洛里娜·彼得罗芙娜·列宾娜(俄国)

Joern Ruesen 约恩·吕森(德国)

Richard Vann 理查德·范恩(美国)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

Q. Edward Wang 王晴佳(美国)

Hayden White 海登·怀特(美国)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守和 于 沛 朱政惠 刘家和平 何 平

何兆武 李幼蒸 周春生 赵轶峰 曹特金

总序

毋庸讳言，眼下的中国史学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这一巨变因同时构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一部分而显得异常深刻。

事实上，这一巨变已延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巨变在悄然加速。巨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个基本的方向。而此时的中国史学，却失去了度量变动的参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正不知该划向何处。

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当前的史界情势！

“历史学往何处去？”从上世纪“文革”结束后就一直是个问题。最初我们想回到前“文革”时代，很快发现不行。80年代，我们急切地拥抱现代化，“反传统”，向往所谓的“西方文明”。90年代，“西方”虽未淡出，但“传统”却卷土重来，与传统互为表里的“国学”也随之复兴重光。出于对所谓“国学”的向往，90年代的知识界集体向民国学术走去。近若干年，我们的学风又在调整之中，回归考据的势头有所减弱，“西学”特别是其中的“西方汉学”或美国中国学重又抬头，乃至有成为“显学”的迹象。但“西方汉学”能成为未来史学界的稳定方向吗？回答显然无法立刻作出。

实际上，史学界仍处在摸索和徘徊之中。

史家的天职让我们懂得，巨变的时代，巨变中的史学，需要一份清楚的历史记录，或者说一份实录。这份记录或实录必须要贴近时代，要同“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相辉映的学术现实共脉动；要尽可能多地容纳大家对其历史去向的望闻问切，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特色各异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诊断与症候分析；还要能引领史学走出当下的迷茫，要竭尽所能地寻找中国史学前行的新航向。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审视和扫描必不可少，而基于不同审视和扫描的批评与专深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当然，第一位

历史的两面

的,是必须要有一份对中国史学存续承继的厚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应是人们进行相关思考的起码的心理基础或共识。

我们发现,能同时体现上述追求的期刊和出版物,不是说没有,而是太过其少。对于巨变中的史学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因此,“新史学沙龙”出焉。

陈启能 王学典 姜 芃

2008年4月

翻译说明

本书最初是根据 2002 年德文本翻译的,德文书名为 Wilma und Georg Iggers, Zwei Seiten der Geschichte. Lebensbericht aus unruhigen Zeiten. Mit 15 Abbildungen,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2.

中译本初稿的“前言”及“从波希米亚到加拿大”、“从汉堡到里士满”、“不平等与隔离”三章由山东大学国际政治学院蒋锐教授翻译;“回到欧洲”、“在布法罗的不平静年代”、“历史学家与同时代人”、“波希米亚文学与私人生活”、“历史的两面”五章及“人名索引”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立新教授翻译;“从美国到‘那边’”一章初由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语系德语专业 2003 级学生曲然和孟雯翻译,后由孙立新校译;“冷战后”这一章选自新的英文版,由唐山学院外语系朱光涌老师翻译,孙立新审校定稿。全书由孙立新校订,孙立新、蒋锐通读定稿。

前 言

合写一部自传的想法是慢慢形成的。最初的激励来自克劳斯·巴德。他是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移民与跨文化研究所所长，曾在1995年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座谈，并把我们的报告冠以《对话中的自传》书名公开出版，作为研究所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而格奥尔格的同事戴维·格尔伯早在1988年就对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采访，目的是要了解我们的生平；同年，格奥尔格的一篇自传性短文发表于《美国犹太人档案》杂志。也是同一年，格奥尔格写的《一个德国犹太人的童年时代》一文在德国《社会科学信息》杂志上发表。1994年，格奥尔格在他的母校里士满大学做了一场报告，讲述了40年代早期他作为犹太流亡者在美国南部一所浸礼会大学的经历。

这部自传是为我们的朋友和儿孙们——如果他们懂德语的话——写作的，但同时也是一部超越民族、大陆、宗教和意识形态界限的时代文献，是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白人与黑人以及冷战时期东方和西方两种生活的历史的写照。本书记录了我们的生活轨迹：在中欧的根，融入北美社会，60年代早期返回欧洲（除了布法罗，哥廷根也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自从1966年以来我们与民主德国的联系，以及威尔玛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与波希米亚的联系。特别是，这本由一名历史学家和一名文学艺术家合作写成的书，可能会对近半个世纪的史学史有所贡献。

书中大部分内容是以我们的回忆为根据的。对于一些记不清楚的事情，我们进行了调查。关于汉堡时期，格奥尔格查阅了汉堡国家档案馆和社会史研究所的资料，其中包括一篇篇幅很长的、有关他童年时代情况的访谈。对描写汉堡犹太人生活环境和犹太文化较为重要的，是与特拉维夫巴依兰大学的米尼阿姆·吉勒斯—卡勒巴赫和格奥尔格的表兄、现居以色列的格尔绍·莱维的交谈和通信；格奥尔格的母亲的童年生活，是定居悉尼的

历史的两面

姨妈克莱尔·戈尔告诉我们的。关于里士满时期,里士满大学档案馆可资利用;关于小石城时期,阿肯色大学档案馆同样如此,那里的林达·派恩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从小石城的费兰德史密斯学院,我们得到了50年代我们在那里时的照片。60年代早期积极参加反种族隔离静坐抗议的年轻白人休·默里,给我们寄来了与新奥尔良公民权运动相关的珍贵资料。我们感谢布法罗大学档案馆保存了对我们的访谈,它也对现存于那里的格奥尔格的书信进行了整理。我们还成功地从前民主德国高等院校暨专科学校部获得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记录我们行踪的档案副本以及三份关于我们的报告。沃尔夫冈·屈特勒尔热情地向我们提供了他所写的报告副本,这些报告记录了他在美国代表民主德国科学院访问我们时的情况。我们还要求人们提供原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Stasi)有关我们的档案,但没有得到。

我们要特别向乌尔利希·尤思图斯表示感谢,他非常认真地校对了全部手稿。还要感谢那些对书中内容进行了审阅的朋友和同事们:达格玛·弗里德里希编辑了大部分章节,并向我们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克劳斯·巴德审阅了全部章节;维尔纳·贝特霍尔德、格拉尔德·狄塞纳、阿克赛尔·费尔—舒尔茨、达格玛·弗里德里希、弗里茨·克莱因、于尔根·科卡、沃尔夫冈·屈特勒尔、汉斯·施莱尔、黑尔加·舒尔茨和鲁道夫·冯·塔登审阅了有关民主德国的章节。此外,于尔根·科卡和鲁道夫·冯·塔登还审阅了其他章节;米尼阿姆·吉勒斯—卡勒巴赫、菲利普·敏登、阿希姆·米塔克和彼得·瓦尔特审阅了有关格奥尔格童年时代的章节;阿希姆·米塔克和玛丽安娜·费尔伯审阅了有关威尔玛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章节;马丁·萨布罗夫审阅了最后的章节。最后,我们要对哥廷根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的计算机专家卡尔·西弗尔林表示感谢,在我们不断遇到技术难题时,是他耐心地帮助了我们。

威尔玛·伊格尔斯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2002年7月于布法罗(纽约州)和哥廷根

目 录

从波希米亚到加拿大(1921~1948年)	1
从汉堡到里士满(1926~1948年)	31
不平等与隔离(1948~1960年)	62
回到欧洲(1960~1962年)	90
在布法罗的不平静年代(1962~1970年)	107
从美国到“那边”(1966~1990年)	131
历史学家与同时代人(1970~2001年)	158
波希米亚文学与私生活(1971~2001年)	197
历史的两面	212
冷战后(1990~2006年)	218
人名索引	238

从波希米亚到加拿大

(1921~1948年)

威尔玛

我于1921年3月23日出生在一个名叫米尔施考的村子里,这个地方既属于波希米亚森林,也属于艾格尔兰。我出生在一幢别墅里,那是1919年在米尔施考村特劳特曼斯道尔弗租佃地上为我父母建造的。别墅正面墙上我父母的花押字表明,人们对这片地产拥有12~24年不等的租期。我妹妹玛丽安娜在不到两年后也出生在那里。

我母亲艾尔莎,娘家姓奥尔恩斯坦,出生于巴伐利亚的瓦尔德明兴,就在边境的那一侧。她的父母双亲是波希米亚犹太人;外祖母以德国血统为主,而外祖父以捷克血统为主。外祖父母结婚不久就移居瓦尔德明兴,1933年才搬回来,住在我们斜对面的比绍夫泰尼茨,一直到我们全家被迫流亡。我母亲和她的两个妹妹进了由修女主持的瓦尔德明兴唯一的女子学校。她学习很好,以至于修女们建议我外祖父母让她去做修女。我父亲卡尔·阿贝雷斯出生于波希米亚乡下的犹太人家庭,全家人都在波希米亚森林腹地的村子里经营农业。他们相互之间讲标准德语,与佣人和村里人则讲方言。

我就生在阿贝雷斯与波普尔“公司”里。流亡国外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此事是多么非同寻常。对我来说,公司和我父母家庭同样重要。这个公司在我出生前很久就成立了。1889年,住在克拉劳维茨附近霍赫里宾的我的祖父理查德·阿贝雷斯,娶了住在莱伊考维茨——一个离多马日利采县城陶斯很近的霍德人村庄——的米娜·波普尔。这个日期就刻在我祖母的结婚戒指上,现在这个戒指已成为我的结婚戒指,正戴在我手上。我祖母和我曾祖父母一起住在霍赫里宾乡下,房子现在还在。我祖母米娜婚后不久写信给她父母,告诉他们她很不如意,所以她的兄弟佩皮·波普尔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尽管他已很富有,还是主动提议与他妹夫理查德共同组建一家

历史的两面

“公司”。公司的一切归两家共有，两个家庭也都以经营农业为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理查德和米娜夫妇搬到了波普尔家附近，住在哈默霍夫，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奥尔伽就出生在那里。

公司从一开始就实行统一收支。大家省吃俭用，勤奋工作，虽然也资助穷亲戚，但从不乱花钱。巧合的是，两个家庭人丁的增长也很对称：一个女儿，她须得到一份嫁妆；两个儿子，也能各自从父亲那里继承一个农庄。

在我父亲于1896年出生前，“公司”就已租佃了比绍夫泰尼茨附近的迈尔霍夫赫拉斯。我父亲和我叔叔雷奥就出生在那里。在离泰尼茨^①三公里远的赫拉斯，除了那个建有几幢工人宿舍的农庄外，就只有一个森林看护所了。

我父亲出生时我祖父给工人们放了假，并赏给他们一大桶啤酒。我记得一只比杯子略大的小咖啡罐上写着：“令父亲喜悦，令母亲幸福，卡尔·阿贝雷斯周岁纪念！”我祖母米娜备受人尊敬。在她去世后，她的三个孙女（包括我）和一个外甥女都被称作威廉米娜，以示纪念。由于她经常要去卡尔斯巴特、美兰等地方治病，所以她的女儿奥尔伽早在学龄时就被送到赫拉茨多维茨她大卫叔叔和耶蒂婶婶那里去了；我父亲10岁时进了布拉格的旧城文科中学，住在他叔叔弗里德尔那里，而他的弟弟雷奥在上小学时就住那里了。四年后，我父亲考入卡登农业中学，并在那里高中毕业。20年代，由于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和捷克斯洛伐克警察之间经常发生流血冲突，卡登城赢得了凄凉的名声。

我父亲作为“公司”里四个儿子中的老大先结了婚。他“偷渡”了我母亲，也就是说，他在战后混乱时期带着我母亲径直越过了边境。大约一年后，他的表弟雨果·波普尔与我母亲的妹妹玛尔塔结婚。几乎同时，雷奥叔叔娶了邻村布里索瓦的伊达·埃克斯坦。最后是阿洛伊斯表叔，他娶了伊达婶婶的妹妹海达·埃克斯坦。这样就又形成了非常对称的关系：四对夫妇中的每一对各自负责料理一个农庄，但所有农庄又归四家共有。尽管我父亲负责作重大决定，尽管不太明显地存在着两个妻党——奥尔恩斯坦姐妹和埃克斯坦姐妹，但所有农庄都经营良好。总之，我们大家都属于这些农庄。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五岁以前，即我们搬回泰尼茨之前。除了泰尼茨，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还拥有许多地产的贵族特劳特曼斯道尔弗家族，在土地改革中也丧失了米尔施考的迈尔霍夫。迈尔霍夫落入一个捷克煤炭商手里，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据说对建立共和国作出了贡献。随之，

^① Teinitz，即 Bischofteinitz，比绍夫泰尼茨的简称。——译者注



我们的所有财产——牲口、机器等——都白白丧失了。在这之前，我祖父理查德·阿贝雷斯已去世，我父亲成了“公司”的首脑。不久，我们向特劳特曼斯道尔弗侯爵租佃了诺伊霍夫的地产，但因为那里没有住所，所以我们搬到比绍夫泰尼茨火车站大街75号我祖父家里去了。直到我们逃亡国外之前，那里都是我们的家。

那时国家常常没收财产，所以不管是佃户还是贵族地主都经常向我父亲求助，请他拿主意，因为他们认为我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且乐善好施的人。他能为大家做什么，我并不清楚。不管怎样，他们都乐意为他的建议付钱，所以到1931年我父亲已攒了100万捷克斯洛伐克克朗，足够用来支付诺伊霍夫地产的首付金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们大兴土木。先是建了一座拱顶大谷仓，然后是三间用稻草和泥土砌起来的猪舍，装着蓝色玻璃窗，以防苍蝇飞进去。许多人都跑来参观我们的猪舍。我们还建了一栋住房，但暂时没搬进去，可能是因为诺伊霍夫太荒凉了，附近没有学校。我外祖父母和其他上年纪的亲戚只是到了夏天才去那里避暑。

诺伊霍夫生产的牛奶大部分被运送到比尔森的商店。对我们来说，比尔森算是“大城市”了，我父母常在那里的瓦尔德克咖啡馆会晤熟人，我们的儿科医生佛戈尔大夫也住在那里。我父亲和佛戈尔大夫一起想出一个点子，就是对牛奶进行巴氏消毒（当时这在我们那里还不为人所知），然后把消过毒的牛奶装进漂亮的玻璃瓶里，贴上画有母子图像的商标出售。诺伊霍夫也生产酸奶，最后还生产苹果汁。

面包是由玛丽·冯特拉施在我们泰尼茨的家里烤的，每周烤一次。她也负责在院子里照看我们以及帮我们洗澡。事实上，面包炉很大，似乎能够轻而易举地把汉斯、格雷特^①连同女巫一起装进去。30年代的某一天，我父亲决定让粮食在自家的面包房里增值，于是院子里的一间旧仓库被改造成面包房，并聘请了一位面包师——基茨贝尔格先生。他是一个有趣的家伙，也许正是这一原因使我们家的面包很畅销。当小河里有虾的时候，一个老头常常用满篓子的虾来换一个大面包。

我们每年期盼的事情，就是到赫拉斯的一个池塘里去捕鱼。每年都有那么一个时候，人们把池塘里的水排出来，穿着长及胯部的胶靴下到泥浆里，把抓到的鱼扔进马车上的大桶里。然后，人们把这些鱼装进大木笼子，放在流经

^① 汉斯(Haensel)和格雷特(Gretel)都是格林童话中人物。——译者注

历史的两面

泰尼茨的拉特布萨河里。当需要换换口味或送人时，就把鱼从里面取出来。鱼通常是鲤鱼，很少有梭子鱼或鳊鱼，有时也能捕到一两条鳗鱼。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都吃鱼，这显然是因为那些佣人都信天主教的缘故。^①

在泰尼茨的大院子里每年都要杀一头猪，这活由一名专业屠夫来干。很久以后，当我除了波希米亚犹太人还认识了另外一些犹太人时，我才知道关于猪还有不少令人惊奇的事情。我自然早就知道猪肉是不洁净的食物，但这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在露天的一口大锅里，煮着辣根肉、肝肠、血肠和香肠，其中一部分被送给城里的人，剩下的就进了熏制室。

“节日”便是安娜节，总在七月份。圣安娜会堂坐落在城西约一公里远的一座长满阔叶树的低矮山丘上。在通往会堂的路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有一组饱经风吹雨淋的砂岩人像，讲述着基督受难的故事。在一组呈现睡姿的使徒像旁边，高高的阔叶树下还放着一条长凳，人们可以在那里安静地读书。一位曾在巴黎工作的泰尼茨女士也在那里给我上法语会话课。但是到了安娜节，那里就不得安宁了。成千入穿着乡下的盛装涌向布满路边的售货摊。借圣安娜的光，我们小孩也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得到一些零花钱，可以为自己买酸黄瓜、土耳其蜂蜜以及其他好吃的东西。大部分赶节的人都要路过我们家，所以我们在好多天前就已烤好了传统的罂粟点心、李子酱点心和奶酪点心。它们被放在木架上的“食品柜”和盘子里，被整块或切成楔形送给赶节客。这种传统本来是朝圣之旅有关的，可我们当时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在许多比捷克人更虔诚的德意志天主教徒那里，这个传统肯定是另一种样子。

总有人要出大价钱购买我们壮丽的果园，但我父母从未考虑过出卖。园子左边是芦笋苗圃，右边是蔬菜和草莓，紫丁香爬满篱笆，下面是盛开的紫罗兰。一条两边长满醋栗的砂石路把园子从中间分开，半路的左边有个凉亭，里面是木条钉成的桌子、凳子和墙壁，阳光可以透过墙上的缝隙射进来。路和园子的尽头是一个长满阔叶树与针叶树的小公园，在最后的几年里，树上吊着一个带小桌的四座秋千架，那是奥尔伽姑妈送给我们的。在我们称为“后园”的公园门口，是一口石板覆盖的极深的水井，我当时确信井里埋藏着三十年战争时期的珍宝；对于我们家大门两旁柱子上的大花瓶，我也同样想入非非。园子的尽头是“空中楼阁”——一座两层高的石塔楼，低层装满了园子里用的家具和工具，我们小孩就在楼上玩耍，吓唬那些从火车站过来的人。

^① 星期五晚上吃鱼是天主教徒的一种饮食习惯。——译者注



在我们家厨房与客厅的窗户前，有一片小小的花园。当花儿开放时，最好看的是小巴旦杏树。在温暖的夜晚，我们常和冯特拉施太太一起坐在环绕小花园的矮墙上，听她给我们讲过去的故事。她以前曾在埃克斯坦家做工，讲的都是那些人小时候的事情，而那些人的孩子现在都已是老头了。

我们家的女佣伴随我们许多年，凯泽—玛丽和玛尔希特都是随同我们一起从米尔施考来的。玛丽有酷爱医学的怪癖，能够一字不漏地记住各种医学杂志上的大段内容，并且总是乐于探讨某些可以不治而愈的疾病。在我十四岁时，玛尔希特出嫁了，替代她的是雷妮。在泰尼茨的院子里还有一个“修配厂”，人们在那里修理“公司”各农庄用的机器。蒂绍帕德先生是那里的负责人，他是来自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的捷克人，是个多面手，后来随我们到了加拿大。农庄里的所有人相互都处得很好：蒂绍帕德先生，他的德意志助手恩斯特，他徒弟温采尔，茨维支肯鲍姆先生——他除了作拉比^①外，还是我家的会计——以及雷妮。

在院子的一角有个小小的畜圈，里面养着各种乡下的牲畜。后来因为关进了几头从外地买来的奶牛，我母亲认为有必要让人给那里加装一面木墙。此外，还有一个狗窝（我们养的最后一条狗是条爱尔兰猎犬，名叫特洛尔），一个牛奶冷藏室，一个工人用的厕所，两棵白杨树，一个水车以及冯特拉施的卧室。

有一次，一个老头来到我们家，说是从美国来的，以前就住在我们家的房子里，那时我祖父还没把它买下来。我们让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转了转，他很感激，然后就走了，而我则尽力想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离开了这房子和院子。后来，纳粹把我们家的房子改成了办公楼，在原先的果园里建了座看起来乱糟糟的，也是出自德国人之手的奶酪厂。我们原先居住的踪迹已荡然无存。

除住在萨茨霍普芬地区的阿洛伊斯表叔和海达表婶外，我们大家都属于比绍夫泰尼茨的犹太社区，总共约十二户人家。除了犹太新年和赎罪日，这里的人们只在周年纪念日，也就是某位近亲的忌日才到“寺”里去祭奠。所谓的“寺”，其实不过是酒厂胡同一幢房子二楼上的一个祈祷室，楼下住着克劳伯一家——他们是唯一赤贫的犹太家庭——以及我们的拉比茨维支肯鲍姆先生。

与其说我们属于犹太人社区，倒不如说我们属于讲德语的泰尼茨资产阶级。几乎所有捷克人都是后来搬来的官员，他们有自己的圈子。但并非所有官员都是捷克人，担任地方长官的也有德意志人，不过直到 30 年代，这

① 拉比(Rabbi 或 Rabbiner)，犹太教的经师或长老。——译者注

历史的两面

种混杂情况都没有造成种族问题。我父亲有时在小酒馆会晤熟人，我母亲则在甜面包师荣格先生那里与“女士们”相聚，所有住在赫拉斯与布里索瓦的叔叔、婶婶们都穿上盛装去参加假面舞会和焰火舞会。在我父母看来，亲戚都是同样重要的。我父母那些已远嫁的姐妹常带家人来与我们一起消夏，他们那些表兄妹以及阿姨叔舅也常来做客，纳粹统治时期甚至有来自德国的犹太人。此外，我父母与周围其他村镇以及萨尔策恩的犹太地主、通往比尔森路上的施塔普砖瓦厂主也有交往。他们的表叔阿图尔·萨尔茨曾是我祖父理查德·阿贝雷斯在卡尔斯巴特疗养时的牌友。他后来成为海德堡的国民经济学教授，是我们熟人圈子里唯一的教授。

我父亲最要好的朋友是弗里德尔·鲁道夫斯基。他是储蓄与贷款协会主席，出身于泰尼茨的望族，该家族从17世纪开始就已定居那里。事实证明弗里德尔是个真正的朋友：在我们1938年被迫逃走时，他预支给我们很多钱，成为我们流亡前数星期在波希米亚的主要生活来源，比如可以用来买车船票。他因此被盖世太保折磨达数年之久。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战后。和大多数德意志人一样，弗里德尔一家（在战后）被赶回德国。当德国处于饥谨时，我父亲从加拿大寄了些包裹以接济他和他的家人。

1927年，我进了德意志公立女子小学。在入学的前一天，我坐在园子里的秋千架上暗自伤怀，因为这是我自由自在的最后日子了。我前三个学年的老师是性情有点乖僻的克韦泰勒小姐，她要同时教三个年级的课。当她给一个年级上课时，就让另一个年级朗读，让第三个年级计算。在领会课本内容方面，我每天都远远超过其他人，因而不留心老师讲课。克韦泰勒小姐为了解决我的——也是她的——问题，就让我朗读或在黑板上抄写一本书中的内容，这本书班里其他人都没有。这样一来，我就阅读了关于中世纪以来泰尼茨的历史和关于约瑟夫二世的传说的书。

我的朋友们都是基督徒，因为几乎没有像我父母这样年龄的犹太家庭，他们的同龄犹太人要么没结婚，要么没孩子或搬走了，所以我也从来没有犹太女同学，只是在上文科中学的很短一段时间里有过一个犹太男同学。星期四不上课，但只要我小学不毕业，就须去听宗教课。宗教课是茨维支肯鲍姆先生为泰尼茨及其周围村镇所有犹太孩子一块开的，所以我们每年都不得不聆听同样的内容。茨维支肯鲍姆先生在1914年14岁时以流亡者的身份从加里策恩来到这里。当其他加里策恩犹太人返回故乡时，他是唯一一个留在泰尼茨的。作为一位聪明能干、个性鲜明的人，他给每个认识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靠在犹太会堂的薪水难以为生，所以还附带做鸭绒和毛皮生意。不算我表



姑索菲·波普尔,茨维支肯鲍姆先生是我们认识的唯一信奉正教的人。

我喜欢读书,而且不加分别地读了很多书。首先,在上小学时我就读了罗莎·冯·坦能堡、海因里希·冯·艾欣费尔斯或吉诺维瓦等骑士故事。古斯塔夫·施瓦布的《古代最美传说》是我最喜爱的读物,我父亲常念给我们听。有段时间我读卡尔·梅(Karl May),然后是少女小说如《固执的人》和艾尔泽·乌瑞(Else Ury)十卷本的系列小说《雏儿》。我很早就读过《多里特勒博士》丛书。我最喜欢的书是捷克犹太作家弗伊特西·拉库斯(Vojtěch Rakous)的《莫德希与雷西》,他在这本书中描写了19世纪后半期波希米亚犹太人的生活。尽管其中有很多理想化的成分,但这本书后来还是促使我走上了学术道路。我最喜欢在园子里的一棵苹果树下读书,因为那里不容易被人发现。



在比绍夫泰尼茨公立女子小学(上排左四)和汉娜·波普尔(上排左三)、
玛丽安娜(上排右六)在一起(约1931年)

在泰尼茨,我本来是很少感觉到德意志人的排犹主义的。如果说有什么使我们与大多数居民区别开来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水准,不过它也仅仅相当于德意志医生、官员和商人的生活水准。也许我家吃得更好些,但这首先因为我们是农场主,或许还因为阿贝雷斯家对于懂得美食一事过于张扬。

在那些上德意志“男童学校”的男孩中,我经历过排犹主义。这所学校紧靠着我家的地盘。在我上学的路上,每天都会遇到十几个男生,有几次他们确实欺负了我。当我还上一年级时,一个男孩用小刀划破了我的上唇,血流不止。我母亲到老师那里告状,但老师偏袒那男生,只是说:“您知道,您女儿也是个小淘气包。”